

收入分配差距 国别论

SHOURU FENPEI CHAJU GUOBIELUN

●董全瑞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收入分配差距 国别论

SHOURU FENPEI CHAJU GUOBIELU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收入分配差距国别论 / 董全瑞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004 - 9392 - 1

I. ①收… II. ①董… III. ①收入分配—研究—世界
IV. ①F113.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4947 号

策划编辑 冯 斌
责任编辑 李树琦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人文在线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28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作为一个专业理论工作者，他的任务就是著书立说——同工人做工、农民种地一样。作为产品，他的论文能够发表在期刊上，他的著作能够出版——不是多多益善，但对于一般作者来说多写是个硬道理。中外历史上不乏以少而精而流传后世的作品。中国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被后人称为“孤篇压全唐”的佳作；美国经济学家科斯以两篇论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含金量最高的作品。但这些毕竟是特例，不能当作普遍真理。

奉行多写是个硬道理的信念，继《收入分配差距因素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之后，《收入分配差距国别论》又与读者见面啦！

这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来讨论各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书，这也是一本不能给读者带来确定性结论的书。但对于本书而言，以下问题是特别需要关注的：

第一，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差距大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底层人群生活状况的改变。富国由于拥有较多的获取财富的手段，不管其国内收入分配差距是大还是小，底层人群的生活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且穷人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占有较多的消费份额。一些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不低，收入分配差距也不

2 收入分配差距国别论

大，但未能将收入转化为人类发展和朝着目标指引的方向取得进步，反而处于退步状态。一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低，收入分配差距也不大，但底层人群的生活状况没有明显改善。一些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底层人群分享到了不成比例的成果。所有这些，都不是市场的罪过，而是一个国家治理水平高低的表现，是区分良治政府与劣治政府的重要标准。

第二，富国与穷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该如何解释。现在，不但国家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已成趋势，而且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比过去更大了。最富有的工业化国家（如卢森堡）和最穷的非工业化国家（如布隆迪）相比，人均收入之比是 439:1，而在 250 年前，最富和最穷国家的人均收入之比大约是 5:1；欧洲与东南亚国家（中国或印度）的人均收入之比约为 1.5:1 或 2:1。

对这种差距该如何解释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如果说市场、制度、教育、科技乃至气候都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因素，但我们仍不能确定其先后次序。令人欣喜的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些穷国乘上了全球化的顺风船。它们基于贸易生利的原则，把比较优势原理推向了新的高峰。一个普遍的做法是改善投资环境，实行对外开放，特别是在吸引富国资本上成就斐然。但全球化并非免费午餐。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代价，就是国内环境的恶化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以及底层人群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减少。

那些错过了乘全球化顺风船的国家更为不幸。战乱、政变、自然灾害的频仍给人民带来了痛苦。这些国家的不幸就是全世界人民的不幸，富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要消除海盗、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就必须改变不幸的局面。而这需要其他国家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其实，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第三，中国该如何扭转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在世界范围内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成为主流的今天，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差距大的国家之一，而且更重要的是与我们的共同富裕目标发生了偏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这么大的巨变中，当然存在着一部分人景况变好，一部分人景况变坏，但景况变坏的人是少数。社会需要保护这些景况变坏的人，这不仅是同情心的问题，这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公正。为了维护人们良知，我们必须确保改革的成果使更广泛的人群受益，特别是落后的人群和落后的地区。

所以，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又是一个社会公正的问题。所谓公正，就是要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公正地对待每一种生产要素，而这需要在投资环境上作出努力。投资环境是一个地区所特有的决定企业进行生产性投资、创造就业以及扩大规模的各种机会和鼓励措施等一系列因素。与这一定义相比，我国各级政府都存在对投资环境的某种片面的理解和行动，即仅仅把投资环境理解为吸收外国资本投资的环境，并不包括或很少包括劳动投资环境的改善，有些地方为了吸收外资不惜以劳动者投资环境的恶化为条件。因此，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不仅对企业有利也要对工人有利，而且应有利于整个社会，能够改善社会整体性的产出。这意味着部分成本和风险要适当地由政府和企业来承担。我国目前不平等的状况和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现实表明，改善劳动投资环境比改善资本投资环境更紧迫。劳动投资环境的改善包括创造就业机会使人们充分就业，使劳动者实现体面的劳动，并保障安全就业，劳动者人力资本要有可持续投资，等等。

此外，“美国”和“中国”两章是本书的“重头戏”。这两章凝聚了我多年来对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的思路和基本观点。

4 收入分配差距国别论

“美国”一章，由于资料翔实、系统、可靠，是“加长”的重要原因。因特网的互联互通，使我坐在工作室里就能浏览到所需素材。“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只有在发达的信息社会才能感受到。大量资料来源于 U. S. Census Bureau 和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网站。这些网站资料的权威性、新颖性和透明度都很高，为研究提供了便利。

“中国”一章，是我饱含激情而又冷静思考的结晶。对于经历过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人来说，市场经济明显优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实施解决了 13 亿人的吃饭问题，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了起来。但市场的缺陷也日见突出，表现为市场并不必然带来公平的收入分配，市场经济可能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这也是必须看到的。中国丰富的实践为描绘收入分配差距演进路线提供了鲜活、丰富的样本材料，使我得以把这一章写得较为充实。

作者

2009 年 7 月 25 日

目 录

自序	(1)
导言	(1)
第一章 全球收入分配差距概览	(21)
第二章 美国	(36)
第三章 中国	(83)
第四章 日本	(155)
第五章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体	(169)
第六章 南亚地区	(183)
第七章 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	(197)
第八章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206)
第九章 撒哈拉以南非洲	(222)
第十章 中东和北非（阿拉伯国家）	(234)
第十一章 瑞典	(243)
第十二章 澳大利亚	(257)
后记	(271)

导 言

人类发展所涉及的问题远远不止是国民收入的升降。它涉及的是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过上富有成效的、创造性的生活。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 年人类
发展报告》（2001）

目前，世界上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什么有的地方富得流油，有的地方穷得民不聊生，乃至有些人铤而走险，从事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海盗？为什么世界贫富格局就像布罗代尔“钟罩”^①一样，“钟罩”内是少数富国，“钟罩”外是大量的穷国？纵览已有的解释，可以分为两种倾向：从富国已有的事实出发去解释富国富的原因——一种好的解释，另一种是从穷国已有的状况出发以富国的富为参照系去寻找穷的原因——一种不好的解释。总而言之，他们不是为富国的富总结经验，就是为穷国的

^①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仿佛生活在一座封闭的“钟罩”里，这座“钟罩”只有享有特权的极少数人可以进入，而“钟罩”本身并不能继续扩张，乃至占据整个社会。参见布罗代尔《商业的发展》，哈珀和罗伊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48 页。

2 收入分配差距国别论

穷找理由。本书无意从中理出一个科学性的结论，对本书而言，有意义的是国富国穷对本国贫困人口的影响。一个国家越是贫困，给下层人民带来的不幸越多，相反在富人或权贵们那里看不到不幸。在贫困国家和地区，一些国王们占有富可敌国的财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官员比富国的富翁们生活得毫不逊色。如果大多数人没有获得收入和财富的机会，现有的财富就可以表现为一种垄断势力。现在，富国的富人不像穷国的富人那样为富不仁，据说他们深受一种“给予”文化的影响，把个人的财富投向了扶贫、积德事业。与此同时，富国的穷人也过了体面的生活，用流行的官方语言来说，他们也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所以，一个国家在总量或平均数上越贫困，收入差距给那些最贫困的人们带来的苦难越是沉重；一个国家越是富裕，其最贫困的 20% 人口的平均消费水平就越高。这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愿意移民甚至偷渡到发达国家这些现象了。富国向穷国展示了它们未来的景象，也为穷国赶超确立了目标。

那么，国富国穷都与哪些因素相关呢？

一 制度激励与西方世界的兴起

新制度经济学家通过比较经济史上各国经济增长的事实，认为西方世界的兴起在于建立了一整套激励机制，其中最主要的是产权、交易费用和信用约束。针对一些学者指出的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是西方致富的根源，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以上所列并不是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本身。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在稀缺经济和竞争环境下，应当创设某种机制把社会成员鼓动起来，去从事有益于社会的活

动，从而让个人和社会的收益趋于一致。那些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不一致的现象说明制度设计或实施方面存在矛盾。

对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人的创造活力这个难题的破解从奴隶社会就开始了。奴隶主试图通过惩罚手段来迫使奴隶就范，但只能激起奴隶的反抗。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一部分奴隶主只好善待奴隶，而且只好实行定额制，即允许奴隶在定额后拥有自己的私产，以致一些能干的奴隶积累了财富，直到最后买下了自己，成为自由民。

（一）产权的界定和保护

西方世界的兴起证明了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安排是激发全社会成员创造活力的源泉。产权是个人对他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的占有的权利，包括使用权、从使用中引出的收益权、排他性权利和交换权。但是，仅仅把产权理解为人与物的关系那就错了。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从事交易的目的是从中获得收益，而产权是人们参与收入分配的一个依据或凭证；如果产权的运行能给其所有者带来更多收益时，就意味着产权的确立产生了激励。可见，产权制度是为要素所有者提供保护和激励而设计的。在这里，创造成果能否得到肯定至关重要。历史上，为了横渡大西洋和国际贸易，航海者们需要测定船只的精确位置，但测定经度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西班牙菲利普二世最初悬赏 1000 克朗征求这种仪器。荷兰把它提高到 10 万弗洛林，而英国最后则愿意拿 1 万至 2 万英镑的赏金。最后，发明家约翰·哈里森得了奖。为了把这种激励制度化，英国于 1624 年出台了一部专利法即《独占法》。一套鼓励技术创新，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使之接近社会收益率的系统

4 收入分配差距国别论

的激励机制随着专利制度的建立才确立起来。没有这种激励机制就不会有人为了社会的利益拿个人的财产去冒险。所以，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与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

（二）降低交易费用是国富的重要途径

诺思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哪里的经济发展得更好一些，哪里的交易费用通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就高一些；而每一笔交易需要较少成本的国家是高收入国家，每一笔交易需要非常高成本的国家则是低收入国家。^① 交易费用在数量上出现的一个悖论就是：高收入国家单位交易费用低而总量比重高，低收入国家单位交易费用高而总量比重低。这样，交易费用“节省”的结果是越来越多即占 GDP 的比重越来越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交易费用的承担者是企业，也就是说，包罗万象的交易费用最终都是由企业来埋单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摩擦力”，当然，对企业来说，“摩擦力”越小越好。但另一方面，变换一下主体，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摩擦力”在一方为成本的同时在另一方却是收益，它们通常表现为律师、经纪人、经理、法官、会计师、警察、文职员和其他等等的收入。交易费用成了“黏合剂”，没有它经济还真难运行，但交易费用过大经济也不能正常运行。在存在竞争市场的环境里，资源会流向交易费用低的地方，这会迫使另一方也降低交易费用，从而是一个交易费用降低的过程。降低的结果是交易机会增多，交易量和交易种类上升，从而交易费用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提高。所以，理解这一

^① [美] 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制度、契约与组织》，刘刚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1 页。

悖论的关键是分清诺思所说的“每一笔”交易费用即单位交易费用和“总量”交易费用即交易费用占 GDP 的比重。比如，我国电话初装费有过每部电话 5000 元的纪录，当时，能安装得起的只是一些行政机关和少数富裕家庭，交易量很小；而初装费下降乃至取消的过程就是用户逐渐增多的过程。现在，固定电话用户达到 1.4 亿，其交易费用总量大规模上升。

交易费用的高低取决于下列因素。

1. 交易费用依赖于—国的制度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制度当中，人类自身发展和福利状况的改进依赖于整个社会所能提供的产品与劳务，而后者又取决于经济制度的运作效率。交易费用越低，制度的生产效率就越高，人类就能获得更多的产品与劳务。但是，交易费用依赖于—国的制度，如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教育文化等诸方面的制度。在高收入国家，产权制度、契约制度相对完备，制度的执行成本较低，从而整个经济体系就能获得很好的绩效。诺思曾反复指出，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穷，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交易费用高。在第三世界国家，人们会看到，无论是资本、劳动还是产品市场，都存在高昂的交易费用。事实上，这些国家的社会交往及其经济活动中所面临的高昂成本是产生低水平绩效和贫困等问题的根源。

2. 在一个社会里，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越发达，与交易相关的考核费用也就越大

交易费用本质上是专业化与劳动分工的成本。斯密认为，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是国民财富增进的途径。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并非免费午餐。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交易费用是为了寻找降低交易费用从而提高总体经济绩效的方法——这在动机上同斯密的专业化与劳动分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我们所做的正是通过实

6 收入分配差距国别论

现更高层次的生产和劳动的专业化。为了做到这一点,交换活动就会越来越多,而每一交换过程都需要花费资源来界定交换的内容和条件。因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交换活动并构成交易费用。但是,分工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① 用斯密的这一独到见解来说明低收入国家市场不发达或市场规模狭小影响分工和专业化,从而他们的交易量也很小也非常适用,即:即使在进入工业化中期的我国,分工有了很大发展的情况下,农民家庭劳动力也很少终生专务一业的。“农民工”这一新名词的出现就是农民兼工人的典型现象的反映。在一些山区,一个农民除种地外,还兼瓦匠、木匠、铁匠、石匠等职业。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是市场狭小的结果从而也就限制了交易的发展。

3. 契约的实施程度影响交易范围和数量

交易费用经济学认为,契约具有两个目的:一是作为促进当事人投资的激励工具;二是必须允许当事人为了从交易中获取好处而进行的迅速而廉价的事后适应的工具。要达到这些目的,就要求当事人双方遵守契约,或当一方违约时,法院或仲裁机构能够廉价而公正地维护契约的实施。在高收入国家,契约的实施成本比较低,因而交易的范围不断扩大,交易的数量迅速增长。而在低收入国家契约实施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比较严重,契约的实施和执行费用都很高,限制了交易的范围和数量,更起不到促进当事人投资激励工具的作用。当出现违约问题时,如果事后不能以较低的费用通过法制手段解决也会影响交易的正常进行。现实世界中“赢了官司输了钱”的诉讼博弈结果说明,即使履约也是

^① [英]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6页。

通过加大交易费用来实现的，过高的交易费用造成了违约合算而履约不合算的现实，其结果就是限制了交易的发展。

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假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郑州一建筑公司需要从景德镇某公司购买 1000 万吨泥土，每吨售价 100 元，共 10 亿元。假设双方对对方的履约程度和对法院解决合同纠纷的能力都不放心，由此导致的局面是，景德镇卖方在没有收到货款之前不肯发货，而郑州某建筑公司又声明在没有收到货之前绝不放款。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选择，双方要么选择绝对不与陌生外地人交易，要么通过某些运作上的安排来规避交易合约风险。一种规避交易风险的办法就是把这一笔大交易分成 100 份小交易，每次运 10 万吨泥土用两天时间，整个交易需要 200 天才能完成。假如双方都能履约很可能两天就可以完成。^① 这虽然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市场不完善造成交易费用的上升在第三世界国家是普遍的。如果整个经济的市场环境都是如此，每人每年完成的交易次数和交易量都会很少。而降低合同的执行费用可以使交易方式从人格化交易转向非人格化交易。在合同执行费用非常高的地方，交换将集中发生在那些相互认识并信任的人们之间。在合同执行费用较低的地方，交换的边界可以从高度人格化扩展到非人格化，从而将家族成员、氏族、社会群体、国家群体甚至外国人都包括进来。这意味着交易范围和数量的扩大从而也是专业化和分工的精细化。

二 殖民者施加的制度颠倒

由殖民者所施加的制度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影响已经受到了学者们的特别关注。一些研究者认为，殖民者对其原殖民地的政

^① 陈志武：《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江苏商报》2004 年 8 月 18 日。

治、法律和经济制度具有决定性影响，进而影响了殖民地的经济绩效。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的研究表明，在过去 500 年里，欧洲国家曾经拥有许多殖民地。其中，在公元 1500 年左右时许多相对富裕的国家或地区到 1995 年变得相对贫困；相反，公元 1500 年前后相对贫困的国家或地区到 1995 年变得相对富裕。例如，在公元 1500 年的时候，印度莫卧尔王朝、美洲的阿兹特克和安第斯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而北美洲、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则是最不发达的地区。但今天，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要比莫卧尔、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所在地区许多国家富裕得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逆转？在作者看来，对于逆转现象最好的解释乃是“制度因素假说”。该假说要求把经济发展的成就与社会组织形态联系起来，认为那些为投资提供了激励和机会的社会，将比那些没有提供激励和机会的社会变得更为富有。这两种社会就是一组不同的社会制度安排。那些为投资提供了激励和机会的社会可以保证社会中广大阶层人士的财产权利，作者称之为“私有财产制度”，那些没有提供激励和机会的社会则存在一组“掠夺制度”，它把社会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人士手中，让大多数国民处在被剥夺的危险里，从而打击了投资，阻挠着经济发展。这样的掠夺制度虽然会对增进社会的总产出起到消极作用，却能增加掌握着政治权力的小集团的租金。

那么，制度假说又是如何解释前殖民地国家相对贫富的逆转现象呢？其基本逻辑是，欧洲海外帝国的扩张是从 15 世纪末期开始的，它给许多殖民地社会的制度安排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事实上，欧洲殖民主义的到来导致了一种“制度安排的颠倒”。其具体含义是，在那些原先较贫穷的地区，殖民者促进了私有财产制度的发展，而在那些之前比较繁荣的地区，他们引进了掠夺制度，或者维持了原来的掠夺制度。出现这种颠倒的主要原因是，

相对贫穷的地区人口相对稀少，让欧洲人可以大量移民过来，并且发展出了鼓励投资的财产保护制度。相反，在人口稠密、相对富裕的地区，建立掠夺制度对于殖民者而言则更加有利可图。

欧洲人是采纳掠夺制度还是引进良好的私有财产制度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作者认为如下两项因素起了重要作用：（1）不同政策的经济效益比较。在掠夺制度有利可图时，欧洲人就会倾向于采纳。对殖民者来说，假如一个地方有比较高的人口密度，那就可以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强迫当地人从事种植业或采矿业，此时掠夺制度就更有吸引力。例如，中美洲地区就有充足的劳动力，有利于在那里建立强迫劳动制度。同时，非洲的人口密度当时比较高，使奴隶贩子们有了向美洲的种植园输出劳动力的来源。其他形式的掠夺性制度在相对繁荣和人口密集的地区同样具有优势。此外，在那些比较富饶的地方，往往有现成的税收和贡赋制度的存在，这也让欧洲人更容易继承当地的体系，继续享受高税收的好处。（2）欧洲人是否在当地定居。欧洲人如果在某个地方大量定居，就容易建立起良好的私有财产制度，其原因在于他们本身的利益将受当地制度环境的影响（他们的目标将与鼓励当地经济发展相一致）。另外，随着大量移民的加入，许多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会像母国的群众一样要求更多的权利和保护，移民在这方面的愿望甚至更强。这种要求将建立一种让社会各阶层普遍受益的财产权利保护制度成为可能。不过，欧洲人是否定居的问题要直接或间接受到当地人口密度的影响：直接影响是，欧洲居民在原本人烟稀少的地区更容易大规模定居；间接影响则是疾病方面的因素。^①

^① [美] 阿西莫格鲁等：《贫富的逆转：现代世界贫富格局中地理和制度的作用》，余江译，《比较》第23辑，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